

无产阶级专政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无 产 阶

卡尔·考茨基著

何 疆、王 禹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Karl Kautsky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Ignaz Brand & Co., Wien, 1918

根据維也納伊格納茲·勃兰特出版公司一九一八年德文版譯出

无产階級專政

〔德〕卡尔·考茨基著

何疆、王禹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1963年7月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書號3002·104 定價（七）0.40元

印數2,001—3,000

出版者說明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說過，考茨基“在关于国家問題上一貫傾向于机会主义”。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写的这本书，更是他在这方面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全面、露骨的表达。他在这本书中极力歌頌資產階級民主，毀謗无产階級专政，主張用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对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极尽誣蔑之能事。列宁的名著《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就是針對考茨基的这本书而写的，他指出，到了这时，“考茨基与反革命的資產者之間实际上已沒有絲毫差別，連一点差别的影子都沒有了”。

本书曾在一九五八年出版过中譯本，是根据英譯本重譯的。英譯本的譯文和德文原文有不少出入，因此我們現在再据維也納伊格納茲·勃兰特出版公司一九一八年的德文原版重新翻譯出版。

目 次

一	問題	1
二	民主和夺取政权	2
三	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7
四	民主的效果	14
五	专政	23
六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	33
七	苏维埃共和国	38
八	实际事例的教育	48
九	专政的遗留物	56
	甲 农业	56
	乙 工业	66
十	新理论	74

一 問 題

現在的俄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一个巨大国家的統治者。这是一个远比一八七一年无产階取得对巴黎市的統治更为重大得多的事件。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却比苏維埃共和国优越。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階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派別都参加了这个事业，没有一个派別置身于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

相反的，今天統治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是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这个政党是在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統治机构之外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的。

两个社会主义派別之間的矛盾，并不是基于微小的个人猜忌，这种矛盾乃是以下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間的矛盾：即民主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两派抱着同样的目的：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階，从而解放全人类。但是一派的道路却被另一派认为是会导致毁灭的錯誤道路。

对于像俄国无产階斗争这样的巨大事件，是不可能漠不关心的。我們每个人都感到迫切地要表示态度，要热烈地表示态度。我們尤其感到迫切，因为我們的俄国同志今天所遇到的那些問題明天也可能对西欧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因为这些問題已經决定性地影响着我們的宣傳和策略的性质。

但是，我們党的責任在于：在我們透彻地审查过双方的論据之前，对于贊同俄国的兄弟內部爭執的一方或他方姑且不作决定。

有些同志想要阻止我們这样做。他們宣称，未經审查就表示贊同現在执政的这一派乃是我們的义务。任何其他态度仿佛都会危害

革命和社会主义本身。而这无非是要把那种恰恰还有待于調查的事情当作已經证明了的事情来加以接受，也就是說，其中一派已經打开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們必須鼓励它繼續走这条道路。

当然，我們要求进行最自由的討論，从而就已經站在民主的立場上了。专政則并不要求去駁倒对方的观点，而是用强力来压制这种观点的发表。因此，在开始討論之前，民主和专政这两种方法就已經不可調和地对立起来了。一个方法要求討論，另一个方法禁止討論。

然而，专政目前在我們党内还不居統治地位；我們这里仍然在进行自由討論。我們认为自由发表我們的意見不仅是我們的权利，而且也是我們的义务，因为只有在听取所有的論点之后才可能作出切合实际和效果良好的决定。大家知道，片面之詞不足凭信。必須公正地听取双方的意見。

因此，我們願意在下面考察一下，民主对无产階級來說具有什么意义；我們應該怎样理解无产階級专政；专政作为一种政体，替无产階級的解放斗争創造了怎样的条件。

二 民主和夺取政权

民主和社会主义（即生产資料和生产的社會化）之間的區別，有时是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的：即有人把社会主义說成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运动的目标，而把民主說成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中用的，甚至会起阻撓作用。

然而精确地說，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的最終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剝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剝削和压迫是針對一个階級、一个政党、一个性別，或是一个种族”。（《爱尔福特綱領》）

我們力求以支持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来實現这个目的，因为无

产阶级作为最下层的阶级，不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一切根源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又因为在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层中，工业无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层：它的力量、战斗力和斗争性都在不断增长，而且它将不可避免地要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今天每一个真正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级，都必须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

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目的，因为在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看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手段。假如有人能向我们证明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而且证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或者说才能最理想地实现（就像蒲鲁东所假定的那样），那末我们就势必要摈弃社会主义，但丝毫不放弃我们的最终目的，甚至恰恰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才不得不摈弃社会主义。

因此，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而另一个是目的。它们二者都是用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

两者的区别在其他方面。社会主义作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没有民主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即使在不是民主基础的其他基础上，也必须进行社会生产。在不发达的条件下，共产主义经济恰恰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恩格斯早在一八七五年谈到俄罗斯和印度一直到今天都保存着的那种村社共产主义时就认定了这一点。（《论俄国的社会关系》，一八七五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

荷兰殖民主义政策曾在一段时期内，在爪哇用所谓“垦植制度”的名义，在土地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替剥削人民的政府组织农业生产。

但是不民主地组织社会劳动的最显著的例子还是十八世纪巴拉圭的耶稣教团国家。耶稣教团教士们作为统治阶级，在那里利用专政的权力，以一种确实值得钦佩的方式组织了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劳动；他们没有使用暴力而赢得了被他们统治的人的拥护。

但是对于现代的人来说，这样一种教权统治就是无法忍受的了。这种统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即统治者的知识水平

比被統治者高得多，而被統治者完全沒有可能把自己提高到同樣高的水平上。一個從事解放鬥爭的階級或階層不能把這樣一種監護制度當成目標，而必須堅決拒絕這種制度。

因此，對我們來說，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把現代社會主義不僅理解為社會化地組織生產，而且理解為民主地組織社會。根據這個理解，對我們來說，社會主義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然而不能把這個命題干脆就顛倒過來。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確實是很可能的。甚至於純粹民主在沒有社會主義的情況下都是可以設想的，譬如，在小農的共同体里，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存在着對人人都完全平等的經濟條件。

無論如何可以這樣說：沒有社會主義的和社會主義以前的民主都是可能的。那些認為民主同社會主義的關係好比手段同目的的關係的人，顯然就是指這種社會主義以前的民主，但同時他們往往急於要補充說，民主其實並非實現目的的手段。對這一結論必須極堅決地加以駁斥。這個結論如果被普遍接受的話，就會把我們的運動導向極不幸的道路上去。

為什麼民主對於實現社會主義來說是一種不中用的手段呢？

這裡涉及的是奪取政權的問題。有人宣稱，如果在一个迄今一直被資產階級所統治的民主國家里，社會民主黨有可能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那末統治階級就會使用它所能調動的一切暴力手段來阻止民主的統治。因此無產階級不能通過民主，而只能通過革命來奪取政權。

毫無疑問，當無產階級在一个民主國家中力量日益強大時，人們就必須估計到統治階級會試圖通過暴力手段來破壞新興階級利用民主。但是這一點却並不表明民主對無產階級毫無價值。如果在上述的前提條件下統治階級使用了暴力，那末它之所以這樣做恰恰是因為它害怕民主的後果。而它的暴力行動無非就是推翻民主。

因此，意料中的統治階級廢除民主的企圖，並不表明民主對無產

階級毫无价值，反而倒表明了无产階級要千方百計保卫民主的必要性。当然，如果人們这样劝說无产階級：民主根本就是一种无用的裝飾，那末无产階級就无从产生保卫民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無論何地的无产階級都如此地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致不能指望他們会馴从地放棄这些权利。相反地，毋宁說可以預料，他們会如此强烈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以致于当对方试图用暴力来摧毁人民权利时，他們对这种行动的坚决抵抗会变成一种政治顛复。无产階級对民主的評價愈高，愈热烈地珍惜民主，那末人們就愈能指望会发生上述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也不應該认为这里所描述的事变进程無論在何处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倒还不必如此泄气。国家愈民主，那末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連軍事上的权力手段在內——就愈依賴人民的意志（民兵）。如果无产階級在数量上还弱小，如像在农业国那样，或者由于无产階級沒有組織起来并且沒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因而在政治上很軟弱，那末，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上述的权力手段也可能变成暴力鎮压无产階級运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无产階級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足以利用現有的自由来夺取政权的話，那末“資本主义的专政”想要調动必要的权力手段来用暴力廢除民主将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馬克思曾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階級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是可能的，甚至大概会有这种事的。一八七二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①代表大会閉幕后，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除了談到其他問題之外，他曾闡述道：

“工人总有一天必定会取得政权，以便建立新的劳动組織。工人必須打倒那些維持着旧制度的旧政策，如果他不像那些忽視和鄙視这类事情的旧基督徒那样放棄‘尘世的王国’的話。

“但是我們並沒有断言，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無論在何处都是一样的。

① 指第一国际。——譯者注

“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不同地區的制度、風俗和習慣；而且我們並不否認，有這樣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如果我对你們國家有更好了解的話，也許我還會加上荷蘭，在這些國家里工人可以通過和平的道路達到他們的目的。然而並不是在所有的國家里情況都如此。”^①

馬克思的預測是否會實現，尚須等等再看。

在上述國家里，有產階級中確實有某些階層，它們想用暴力來對付無產階級的傾向正在增長。但是另外也還有其他的階層，它們對無產階級日益增強的力量的尊重以及它們想要通過讓步來討好無產階級的願望也正在增長。儘管戰爭狀態在其持續期間無論在何處都大大地束縛着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的行動自由，然而戰爭狀態却大大地擴大了英國無產階級的選舉權。目前還根本無法看出，在不同的國家里，民主將如何影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形式，以及民主在促使雙方都避免使用暴力而只採用和平方法方面將起多大的作用。無論如何，民主的存在在這方面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在一個民主共和國里，人民的權利几十年來、甚至几百年來已經在那里牢固地扎了根，這些權利是人民通過革命而贏得並且保持或擴大的，同時人民也教育統治階級要尊重人民群眾；在一個這樣的共和國里，過渡的形式肯定將不同于那樣的國家，其中軍事專制統治迄今一直毫無限制地擁有鎮壓人民群眾的最強大的權力手段，而且習慣於用這種手段來鎮壓人民群眾。

然而在社會主義以前的時期內，民主對我們的意義並不僅限於民主對於過渡到無產階級統治去的形式所發揮的影響。對我們來說，民主在這個時期內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民主對無產階級的成熟所發揮的影響。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264頁。——譯者注

三 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会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和必要的特殊历史条件。这可以说已被公认了。但是，为了使现代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究竟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条件，也即一个国家到什么时候才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在一个如此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如此，现在促使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毕竟还含有一些可喜之处。因为这种必要性是由此而产生的：即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某种像在战争爆发时某些重新学习派人士向我们所保证的那样，要在几百年以后才会实现的事。社会主义已经作为实际问题而被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那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动都是以意志为前提条件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这种意志是由大企业所造成的。在小企业在社会里占优势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由企业所有主构成的。没有财产的人为数很少。这些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获得一小笔财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愿望会具有革命的形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只会把现有的财富按照人人都成为有产者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小企业经常产生着那种要保持或取得对那些用于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意志，而不能产生那种要社会公有制、要社会主义的意志。

这种意志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在群众中出现：即大企业已经很发达，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已不成问题，解散大企业就会是一种倒退甚至是不可能的，大企业的工人只有采取一种社会化的形式

才能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能维持存在的小企业都在日益衰落，以致于小企业主不再能依靠小企业来维持小康景况。这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才会增长起来。

与此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可能性也随着大企业的兴起而增大起来。小企业的数目愈多，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也就愈大，要把它们以社会化的方式加以组织起来也就愈加困难。这种困难随着小企业数目的减少，随着它们之间关系的日益经常和固定而相应地减小。最后，随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以及物质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原料——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就必然存在了。那些要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成为强有力的，必然会比那些不要社会主义的人更强大有力。

这个因素也是由大企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大企业意味着无产者——也即实现社会主义符合其利益的那些人——的人数增多，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的人数减少。这种减少是在与无产者人数相比之下的相对减少。若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也即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相比，资本家的人数在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增多。但是，无产阶级在全国是壮大得最快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从经济发展中直接产生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在没有人作用的情况下自己产生的，但是它们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作用的情况下，单单靠资本家的作用而自己产生的；资本家对于大企业的成长感兴趣。这种发展主要是城市的和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的一种微弱的余波。社会主义是从城市和工业里产生的，不是从农业里产生的。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需要有一个第四因素：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拥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持久的生产方式而付诸实现。

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除了条件的成熟和工业发展的必要水平之外，还必须加上无产阶级的成熟。但是这个因素不是光靠

工业发展，光靠资本家牟取利润的努力的作用，而不要无产阶级本身的作用就能产生的。这个因素必须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努力中产生。

在小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没有财产的人分成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手工业工人和学徒以及较年轻的农民子弟，他们的无财产状态只是一种过渡阶段。他们指望有朝一日会成为财产所有者，并且对私有财产有兴趣。没有财产的人中间还有一种人是流氓无产者，这是一个对于社会说来是多余的甚至是增添麻烦的寄生虫阶层，他们没有教育，没有觉悟，也不团结。遇有可能的机会，他们也很愿意去剥夺有产者，但是他们既不願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了这个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群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为数众多而到处充斥的。资本主义把这些多余的甚至是有毒的寄生虫转变成生产上的、从而也是社会上的必不可缺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增多着他们的人数，从而扩大着他们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使他们仍然停留于无知、粗鲁、无能的状态。资本主义甚至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压低到流氓无产者的水平。由于劳动过度、劳动的单调乏味以及女工童工的劳动，资本主义甚至往往把工人阶级压低到还在从前流氓无产阶级的精神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于是，从贫困化中就产生了要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动力，即力争终止那日益增长着的群众贫困化。但是这种贫困看起来仿佛会使无产阶级永远没有能力来解放自己。仿佛应该靠资产阶级的怜悯来拯救他们，并且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

人们很快就看出，不可能从这种怜悯中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实现社会主义的足够力量，人们只能指望从那些其利益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也即从无产者那里获得。但是他们难道没有灰心得绝望了吗？然而，无产者毕竟没有全都灰心绝望。还有某些阶层依然保持着向贫困作斗争的力量和勇气。这一小部分人似乎还能做那些

空想家所不能做的事，似乎能用一次突然的襲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从而給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这就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无产阶级过于愚昧无知和心灰意冷，以致不能組織和管理自己，仿佛應該由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組成的政府自上而下地来組織和管理他們，正如耶穌教团当年在巴拉圭組織和管理印第安人那样。

魏特林預料会有一种个人专政，这个人能率領一支胜利的革命队伍来实现社会主义。他把这个人称为救世主。

“我看出了一个佩带宝剑的救世主的来临，他是为实现先知的教义而来的。

“由于他的勇敢，他能成为革命队伍的領袖，并且借助于这支队伍，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机构，而使眼泪之泉流入遗忘之海，并使人世变成天堂。”（見《和諧和自由的保证》一书，一八四九年第三版，第312頁）

好一个偉大崇高和振奋人心的預見。然而，这种預見仅仅建立在一支革命队伍将找到它理想的領導人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人們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救世主，如果人們深信无产阶级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而且深信只要无产阶级在其所夺得的各种組織中、因而也在国家中还没有具备自治的能力，社会主义就注定只能是一个空想的話，那末，由于資本主义已經使工人阶级貧困化，社会主义岂不已被宣布为毫无希望了嗎？这看来好像如此。然而，实践和理論立即指出了一条出路。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首先开始了一个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民主权利，获得了进行組織和宣傳的一些可能性，而且，资产阶级在同貴族进行爭取选举权的斗争中甚至呼吁他們起来采取行动。

最初的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貧困化和无权状态的斗争，都首先发源于工会和宪章运动者；无产阶级的罢工以及要求选举权和正常劳动日的巨大斗争也是在工会和宪章运动者中間开始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看出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貧困化学說”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学說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他們同其他一切

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是共同的。但是他們比其他社会主义者高明，因为他們不仅仅看出了資本主义的貧困化趋势，而且还看出了无产阶级的反貧困化趋势，并且他們在这种反貧困化趋势中，也即在阶级斗争中，看出了重大的因素，这个因素会提高无产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阶级所必需的，如果无产阶级不仅是要利用机会、作为偶然的成功而夺得政权，而且还要能够保持和运用这个政权的话。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即使这种民主并不就是“绝对民主”和“纯粹民主”，它也应该是为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的民主。而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用秘密方法是根本不够的。少数的传单不能代替广泛发行的日报。群众不能用秘密方式来加以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秘密组织总会导向个人独裁，或一小撮领导人的独裁。普通的成员在这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在被压迫阶层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就成了必要的，但是它不能促进群众的自治和独立性，倒很可能会加强领导人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和他們实行独裁的习惯。

就是这位竭力頌揚救世主作用的魏特林，曾极其輕蔑地談論民主。

“共产主义者們在政府形式的選擇問題上意見依然还相当不一致。法国很大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傾向于专政，因为他們十分明白，共和主义者或者更正确地說政治家們所理解的那种人民統治，对于从旧組織到完美的新組織之間的过渡时期來說是不适宜的。尽管如此，卡貝^①还是从共和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人民統治的原則，但是他懂得很巧妙地使这个原則在过渡时期內加上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专政。而英国共产主义者領袖欧文，則終于认为每人都應該按其年紀大小而执行一定的职务，因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同时也就是政府中最年长的人。除了傅立叶派认为任何政府形式都一样以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

① 1788—1856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譯者注

为，那种被人称为人民統治的政府形式，对于这个刚刚兴起的还有待实现的共同体原则来说是一种极不适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支柱。”（见《保证》一书，第147页）

魏特林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需要民主。

“如果人民統治这个概念是合适的，那末所有的人都必須实行統治。但这是永远也不会有事情。所以，它还不是人民的統治，而是人民中一些人的偶然的統治。”（见第148页）

魏特林想要由最偉大的天才来統治。这种天才应该在科学会议上用解答有奖难题的方式評选出来。我之所以更詳細地援引魏特林的話，是为了表明这种被当作最新的智慧介紹給我們的对民主的輕蔑，是一种很陈旧的看法，它是从工人运动的十分原始的状态中产生的。在魏特林輕蔑地嘲笑普选制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同时，英国的工人却在爭取这些权利，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工人这一边的。

从那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在无数次——常常是流血的——斗争中，接連爭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民主权利。而且由于他們为了贏得、保持和扩大民主而进行斗争并且不断运用各种民主权利来进行組織、宣傳和爭取社会改革，无产阶级就一年一年地愈加成熟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从人民群众中最低的阶层变成了人民群众中最高的阶层。

无产阶级因而就已经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成熟程度了嗎？社会主义的其他条件也已经具备了嗎？这个问题今天是頗有爭論的，有一些人的答案是坚决肯定的，而另一些人的答案則是坚决否定的。在我看来，这两种答案未免都过于輕率。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性，不是一种在我們还不能用实例来进行实际論证之前就可以靠統計数字来确定和計算的情况。無論如何，像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討論这种問題时过分地強調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是錯誤的。毫無疑問，沒有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硬說只有在資本主义不再能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